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

中国古代安全思想探源

■ 郭丽娟 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项目编号：3142014016
3142015026 3142013104）

中国古代安全思想探源

郭丽娟 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安全思想探源/郭丽娟著.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 - 7 - 5653 - 2541 - 0

I. ①中… II. ①郭… III. ①安全意识—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X911 - 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8844 号

中国古代安全思想探源

郭丽娟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普瑞德印刷厂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

印 张: 8.125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19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653 - 2541 - 0

定 价: 30.00 元

网 址: www.cppsups.com.cn www.porclub.com.cn

电子邮箱: zbs@cppsup.com zbs@cppsu.edu.cn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法律图书分社电话: 010 - 83905745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主张人类发展的真正基础在于普遍主义——承认每个人的生存权利。对于生存的威胁来自各种不安全因素。当今人们的不安全感更多地来源于对日常生活的担忧，而不是出于对世界灾难性事件的恐惧。职业安全、收入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免受犯罪之害的安全——这些是全世界人民对安全问题关注的新焦点。

综观当前频发的各类安全问题，除了那些由于自然因素或“上帝的意旨”等不可抗力导致的以外，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人为性”和“缺德性”。在事故的致因中，人的不安全行为占有很大的比重，即使是来自物的方面的原因，在物的不安全状态背后也隐藏着人的行为的失误。在目前的条件下，还不可能运用工程技术手段完全消除物的危险状态，实现本质安全，因此在事故的发生和预防中，人的因素具有特殊的作用。如何控制人的不安全行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中国古代思想中丰富的人本思想和人文关怀，强烈的自我约束教育和道德利他主义，厚重的生命关怀和敬畏意识，浓厚的忧患意识和安危转换的方法，安心、安身的基本人生观和居安思危的态度为控制人的不安全行为这一难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安全作为人类的基本需求，是一个范围极其广泛的领域。作为中国古代思想与安全问题结合的探讨，本书力求有理有据，避免牵强附会。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安 ān



在一间静静的屋子里，有一个女子（参见“女”字条）手置胸前，安详地坐着（古人习惯席地跪坐），本义是“安定”、“舒适”、“安全”。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导论 基本概念分析

“安全”的范围极其广泛，保障“安全”涉及各个方面，因此对“安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非常重要。

一、“安全”的词义分析

安，甲骨文（房屋）+（女），表示房中有妇孺、家眷，有房有家是父系社会中男子的基本需求，顺利兴宅、娶亲，便能安居乐业，挫于兴宅、娶亲，则焦虑恐慌。金文、篆文承续甲骨文字形。隶书将篆文的“女”写成。《说文解字》有云：“安，静也。从女在宀下。”进而引申出安静、安定、安稳……

全，金文（人，放进）+（下，地下）+（“卯”，疑是双手的变形），表示放在地宫中的物品。籀文（人，放进）+（玉，宝石）+（化，死亡）+（又，持有），表示持玉入葬。有的籀文省去“化”，将“又”写成双手，强调高贵的亡者双手持玉入葬。篆文异体字省去籀文的双手，字形简化成人葬之玉。篆文用“工”代替“玉”，强调葬玉制作之精工。隶书承续篆文异体字字形。《说文解字》有云：“全，完也。从人，从工。”“全”，篆文全从玉，纯

玉曰全。“全”具有纯粹、完整无缺之意。

安—全连用，在古文中出现的频率很低，如汉代焦贛在《易林·小畜之无妄》中所云：“道里夷易，安全无恙。”《百喻经·愿为王剃须喻》有云：“昔者有王，有一亲信，于军阵中，殁命救王，使得安全。”北宋范仲淹在《答赵元昊书》中所云：“有在大王之国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虽然将安—全连用，但是在古文中，出现率更高的是以“安”指代“安全”，“安”字在许多场合表达着现代汉语“安全”的意义，表达人们通常理解的“安全”这一概念。例如，“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系辞》）。此处，“安”与“危”相对，并且如同“危”表达现代汉语的“危险”一样，“安”所表达的就是“安全”的概念。《现代汉语词典》对“安全”的解释是：“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即安全意味着没有危险且尽善尽美。这是与传统的安全观念相吻合的。

没有危险作为一种客观状态，不是一种实体性存在，而是一种属性，因而它必然依附一定的实体。当安全依附于人时，便是“人的安全”；当安全依附于国家时，便是“国家安全”；而当安全依附于世界时，便是“世界安全”。这样一些承载安全的实体，也就是安全所依附的实体，可以说就是安全的主体。考察古文中的“安全”，或者“安”、“全”，安全的主体无非“人”、“物”或者“事”三类，我们关注“物”的安全或者“事”的安全，归根结底都是以“人”的安全为出发点。一般认为，“人的安全”这一概念出自199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人类发展报告》。

《人类发展报告》认为，“人类安全有两大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免于诸如饥饿、疾病和压迫等长期性威胁的安全；其二是在家庭、工作或社区等日常生活中对突如其来的、伤害性的骚扰的保护。”

“人的安全”包含两个不同层次的含义：一是安全的客观存在状态，是一种免于威胁的真实状态；二是个人对自身安全的主观感

受不存在基本需求会受到攻击的恐惧。所谓安全的状态是不被威胁和不必担心受到威胁。安全是个人的基本需求，是国家政权提供给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社会良好有序发展的首要条件。

根据人的基本需求，《人类发展报告》界定的七类安全分别是：经济安全（基本收入有保障）、粮食安全（确保粮食供应充足）、健康安全（相对免于疾病和传染）、环境安全（能够获得清洁水源、清新空气和未退化的耕地）、人身安全（免遭人身暴力和威胁）、共同体安全（文化特性的安全）和政治安全（基本人权和自由得到保护）。

以上七类安全可以概括为四个层面：第一，粮食供应充足，基本收入有保障，生存获得保障；第二，免遭突如其来的暴力和威胁，不必颠沛流离，担心肉体的不正常消亡；第三，能够获得安全的自然环境，不必过度担心环境污染对健康的威胁；第四，人格平等并被尊重，享有基本人权和自由，个人价值和精神信仰不被侵犯。例如，维护个人尊严不会导致财产损失、生活困扰和精神折磨，争取公民权利不会遭致个人危险和利益损害，见义勇为帮助他人不遭诬陷。

“以人为本”意义上的“安全”是个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和义务，1789年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第2条规定，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德国政治学者洪堡在论述国家的安全责任时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在实施赋予他们的权利中不受外来的干预，我才称他们是安全的，权利可能涉及他们的人身或者他们的财产；因此，安全——如果说这种表述听起来不太过于简单、因而也许是含混不清的话——就是合法自由的可靠性。”（《论国家的安全》，1792年）那么，主张自身权利或者为他人伸张权利，带来对自身的生命、财产、精神等的威胁，即是不安全。因此获取安全的途径必须由军备方式转变为人类发展的方式，即强调人的生命以及人的尊严，让所有的人都摆脱恐惧和贫困；必须由

保卫领土、主权的安全观念转向保证食品、就业和环境等方面的综合安全观。

在“国际共同安全”大会（1993年）上，专家们强调：“世界上所有意外死亡事故中，仅有7%是职业事故，56%属其他事故。”而同年美国的生产性事故（职业事故）为10%，其他事故（非生产性事故）为47.2%。20世纪80年代，日本每年非生产性事故死亡人数为生产性事故死亡人数的8倍。英、法、德的伤亡事故统计表明，生产性事故也只占总死亡人数的10%左右。而这几年国内的矿山和工矿企业生产性事故的死亡人数也只占总事故死亡人数的15%~20%。因此，从安全科技文化的角度，要求人民建立安全的新观念，在重视安全生产的同时，把更多的力量投入家庭安全、消防安全、交通安全、产品安全、药物安全、保健和娱乐安全，以及环境保护与其他安全。

从人性到制度，从哲学到政治，从理论到对策，关于安全的研究和对策层出不穷。若就当下论当下，就西方论中国，这样的研究和对策未免有失厚重，难免“水土不服”，或许探讨异质的前工业化社会，能起到“以他山之石攻此山之玉”的效果。当代中国社会遭遇的各种安全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以人的生命和尊严为核心的价值观的缺失，以及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严重失衡，乃至断裂。安全社会的构建离不开价值观建设，中国传统思想中有着丰富的以人为本、张扬高贵人性的资源，可供当下中国社会安全秩序的重建。传统典籍中记载了各个时期各行各业的生产情形，如建筑设计安全、食品安全等，包括“预则立”、整体观念、监管体制等，蕴含着各种安全观念和方略，对现代社会的安全活动具有借鉴价值。目前我国对安全历史学的研究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应当树立新的安全史观，并整理史料，从纵向、横向各个方面进行研究对比，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安全发展中的现象，找到影响人类安全的社会原因、制度原因、技术原因和文化原因，为制定安全策略提供历史依据。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安全的思想十分丰富，剔除其中的糟粕，儒家、道家和墨家等学说中都有关于对人的命运的关怀、对于安全隐患的防范、抢险救灾、事故处理等方面的深刻思想，如《论语·乡党》有云：“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虽然在当时，奴隶或平民的身价往往远不如贵族的马匹的身价，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孔子首先关注的并不是他的财产利益得失，而是喂马的奴隶或平民的人身与生命的安全。诸如此类的传统文化都需要我们去发掘、整理。这将成为有中国特色的安全文化的重要的思想资源。

古希腊以理性为人的本质，奠定了近现代西方理性文明的根基。西方的安全文化建立在基督文化的基础之上，而中国的安全文化并非完全建立在中国的传统安全文化基础之上，两者并未达到相濡以沫的程度。目前我们的安全文化实际上是“快餐文化”、“速成文化”，是没有经过日积月累、长期积淀的“表层文化”。我们只有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地继承的前提下，才能建立、形成适合现状的安全文化。新心学大师贺麟先生说：“任何一个现代的新思想，如果与过去的文化完全没有关系，便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绝对不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所谓新，应当是有历史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①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精华与糟粕并存，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着久远而深刻的影响。现代安全文化破土而出，方兴未艾，带来了人们对安全的重新审视和深层次的思考。在当代中国构建、传播和形成现代安全文化，必然会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冲突与交融。在这个过程中，只有认真分析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性，才能找到两者的结合点，完成从碰撞到结合，从冲突到交融。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我们的责任在于加快这一进程，缩短这一过程。只有现代安全文化全面形成并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的时候，我国的安全

^① 贺麟著：《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页。

形势才能出现一个根本好转的局面。

本书探讨的“安全”是“人”的安全，即人的生存发展持续保持正常完好的状态，包括客观的安全状态和主观的安全感受两个层面，人的生命安全、权利安全、心理安全三个维度。以中国历史上的经典哲学著作为蓝本，关联后人的解释理论，从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三个方面探讨基本的和广义的安全问题，结合不同的主体安全，探究中国古人的安全智慧。

二、“安全哲学”的可能性

西方传统哲学以本体论为核心命题，致力于寻求“存在之所以存在的根据”，在经验的存在者与先验的存在者或者现象与本体之间划出一条鸿沟，对“终极关怀”问题的渴望令其陷入二律背反的误区。当代哲学把客观对象看成是有结构层次的现象性的存在，使哲学研究的对象从抽象的本体转移到认知方法、价值观念、美感心理等直接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现实问题方面。

其中，“安全”问题以其时代性、普遍性和突出性进入哲学的视域当中。

“安全”问题的时代性体现在高风险社会带来诸多未知风险，高科技时代引致若干安全隐患。2013年末，中国大陆城镇常住人口为73111万人，城镇化率为53.73%，现代工业化、都市化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众多难以控制的灾难，如交通、用水、用电、防火、环保、楼群建筑、医疗保健系统等意外灾害问题，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安全与健康。随着科技的广泛应用，安全问题不再是单一领域单一范围的问题，而是已经渗透到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并且危害性大，危害范围广。因此，应当树立“大安全观”，进行安全知识教育和安全文化建设，从而使人们在天灾人祸大难临头时能应变自如，把伤亡和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保障社会稳定，城市及社区少灾，人民平安。

安全问题源于风险。古今中外，风险带来的焦虑伴随着人类。

当一个人被抛入世之后，便展开了一个向死而生的过程，由于死亡带来的终结性，对于有限人生的思考便构成了人之本性，现时选择带来的不可把握和无法确定的未来构成了人的焦虑。这种焦虑在“风险社会”中扩大到了极致，人的理性在不可控的庞大风险面前显得更加无力，面对如此不可预测的未来，人们既定的伦理观念遭遇了挑战，确定的为人做事的准则不再让我们那么心安理得，我们变得更加患得患失。

风险概念在中国真正流行，还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也就是在 1994 年全面经济改革之后。到今天，中国已然从一个对风险没有概念的社会，变成现在这样一个很多人存有危机四伏感觉的风险社会。德国风险社会理论大师贝克认为，今天的现代风险是不可见的，来源于工业理性的过度增长，尤其是人类技术能力的发展及其后果难以测算和不可控，且逐渐演变为人类社会历史的主宰力量；现代风险不只是自然科学或环境问题，而且根本上是人的问题、社会问题；因而风险管理成为处置现代社会不安全和偶变性的的重要手段。从规模和范围以及后果程度来看，风险社会与传统社会有很大的区别，尤其是就风险成因或根源来看，以前社会中传统风险主要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带来的风险”；而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则主要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晌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

吉登斯认为，风险社会的时代特征在于：原有的发展确定性、方向性及其科技专家的信任受到质疑，甚至出现贝克意义上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新型风险穿越时空，具有普遍扩散性，传统的阶级、民族、国家等集合性社会概念让位于风险个体化、全球化，与过去决定未来不同，风险社会里是未来决定现在及其选择；风险社会需要重新界定和发展道德，这使得个体需要反思生活方式，社会需要反思环境运动和社会运动等社会性事务。因此，贝克（Beck）将“安全”视为当今“风险社会”的动力基础和价值追

求,规避风险,免除焦虑,寻求心安理得成为当今伦理秩序建构的难题。

高风险社会和高科技时代导致“普遍性”和“突出性”成为“安全”问题的显著特征。由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人类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而对自然的掠夺性开发,以及技术发展过程中的“异化”,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迅速兴起,涵盖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当下学界探讨的“安全”问题已经超出传统安全的范围。从个人层面到社会层面,从人伦关系到生态伦理,都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近年来不绝于耳的海啸、飓风、山体滑坡、恐怖袭击、禽流感、矿难、化工厂爆炸、饮用河水污染、儿童伤害、女性侵犯、价值紊乱……让我们无法免于恐惧。毒奶粉、瘦肉精猪肉、毒姜毒蒜、地沟油,如同电脑病毒程序,总是删除不了,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来自自然、社会、他人的恐惧和威胁,我们不禁自问,本是符合人类本能、人类基本要求的“安全”,每个人都需要的远离伤害的感觉,时时刻刻与每个生存者同在的安全感,为什么在堪称文明社会的当下,会变得如此稀缺,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和严重的社会问题。

进入近代社会以后,淡化价值问题,摆脱伦理学束缚的社会科学逐渐盛行。政治学领域内的马基雅维利和经济学领域内的曼德维尔成为了“价值中立”原则的最早倡导者。后来,他们的思想被不断整理和发展,最终成为实证主义的主导思想之一。“‘价值中立’原则要求研究者在分析某一社会现象时,把价值评价和道德情感放在一边,只是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什么样的手段将导致什么样的目的,而不问这个目的是合乎道德的还是不合乎道德的。”经济学领域内,追求利益最大化成为核心目标,在中国,经济决定论将对伦理的轻视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在享受经济繁荣带给我们的便利和物质享受的同时,也在遭受着经济繁荣带给我们的弊害。经济活动本着“竞争、效率”的原则建立起硬性的经济管理约束机制,以应对市

场的残酷竞争，追求自身最大经济利益。利润最大化成为企业发展的主要目标，市场竞争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关系到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利益。因此，经济效益自然成为企业优先考虑的问题，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效益最大化和稳定发展上，这便给安全生产带来了影响。为了降低成本，安全投入减少，很少考虑到工人的生命安全，片面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安全生产机构设置和安全人员配备数量减少，安全投入不足，安全措施和装备严重欠账。为求短期利益最大化，降低产品质量，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危害着消费者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安全。追求经济增长速度，采取粗放的增长模式，大肆挖掘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生态安全陷入积重难返的困境，损害着社会成员的健康安全。

中国商业生态环境更加糟糕，虽然已就企业伦理规范的重要性基本达成共识，但是在经济决定论占主导，社会伦理规范缺失的大环境下，一直处于“知而不立、论而不建”的境地。“物质决定精神”的泛化和滥用在当今中国达到了极致，本是局限于经济结构的话题，泛滥到各个社会领域，本是事实世界的内容无情地吞噬了意义世界，完全破坏了伦理秩序，伦理价值被“先有物质才有精神”踢到了九霄云外。以“人”为工具，甚至不惜牺牲“人”的生命安全和人格尊严来获得经济效益的发展模式，以丧失人格来获得物质利益的生存状态带来的精神焦虑和麻木危害着社会成员的心理安全 and 精神健康。

然而，随着东南亚经济的迅猛发展，以《论语》为核心讲求道德的儒家思想和近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结合起来，通过对《论语》内在精神的再度挖掘和诠释，探索出“经济道德合一”说，认为抛弃利益的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而完全的财富、正当的殖利必须伴随道德。进而借由“仁”这一内在媒介，将儒家传统思想所提倡的诚实信义、禁欲节俭、辛勤劳作等道德要素外化为商业行为的指导原则，从而确立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道德秩序。日本学者涩泽援用了儒家经济思想并积极结合西方思想培植出颇具日本特色的资

本主义经济伦理，为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道德基础。

企业伦理研究兴起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主要是探讨企业的社会责任、道德责任、伦理规范等内容。其产生的根源在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相当数量的大公司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造假、商业欺诈等违法和不道德行为，造成企业的信誉损害和整个商业社会的群体生态环境恶化。在法律规范不足以解决问题的情况下，美国工商界和理论界开始求诸伦理道德规范“企业伦理”，挽救并维持着美国工商社会的某种商业道德和企业社会责任，建立起一个运行良好的商业生态系统。

安全成为哲学关注的话题，被称为“安全哲学”，即以“安全”问题为研究对象，包含世界观、人性论、方法论和价值观。

三、“安全哲学”的资源

由于“安全”是人类的核心话题，古今中外对“安全”的思考从未中断，“安全哲学”拥有着丰富的史料。这些资料可否为今所用，尤其是在现代化的语境之下。

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一直存在两种声音，百年间推倒重来的全盘西化抑或是坚守传统的中体西用此消彼长，按照所谓的“辩证”思维，上述两者在不同的层面上各有道理，即现代与传统既异质又一脉相承，故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既要分析其异质所在——所谓糟粕，又要寻求相同、可借鉴之处——所谓精华。现代化中的安全问题也不例外。“安全哲学”需要从传统思想中寻求相通之处，获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防范古今不同“质”的地方，弃其糟粕。

有一种观点认为，17 世纪前，人类的安全观念是宿命论的，行为特征是被动承受型的，以此为人类古代安全文化的特质。反过来想，通过探讨异质的前工业化社会，或许可以在更根本的问题上发现相通之处，诸如跨越时代的人性和人类基本思维方法。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进程中，流传于传统文化长河中的安全哲学思想，

对今天社会的安全活动仍具有参考价值。

从逻辑上来讲,传统中国可以为当今安全问题提供资源。由于人类无法割裂传统,现代社会的安全问题必然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包括传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只有了解传统文化,才能够理解和处理当下的安全观念和行为。

人类的历史越是向前追溯,一个现象就越加明显,即人类力量越渺小,人类智力的作用越有限,故而对于自然界越畏惧。因此古人的世界充满凶险。由于畏惧,对安全的渴望更加强烈,古人寻求安全有两条途径,一是诉诸科学和经验,利用已经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获得各种需要,保障生存安全,在利用自然的过程中,获得安全感。其二,对于人类无力了解的自然规律和无力应对的自然灾害,只能求助于天地神灵。万物有灵,是人类先民的普遍信仰。先民认为,不仅人有灵魂,日月山河、树木花鸟等,无不具有灵魂。通过对各种图腾和神灵的崇拜,先民获得一种安全感。在有 7000 多年历史的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大量饰有鸟和太阳图案的艺术品,其中“双鸟朝阳”象牙雕刻件尤其引人关注,将其视为安全文化的滥觞绝不为过。对鸟的崇拜,即生殖崇拜;对太阳的崇拜,即自然崇拜。人们认为太阳具有使万物复苏、生长的超自然力量,便将其视为神加以礼敬,以求太阳对生命万物给予庇护。“双鸟朝阳”是远古时代人类朴素的安全观在图腾中的体现。

中国文化早在轴心时期就充分彰显了理性,总结了颇多对世界规律的认识,为不断获取安全的生存环境和心理环境提供了有力保障,此即所谓的安全世界观。

最早全面反映中国人传统安全思维的书籍之一是《周易》。《周易》是一本有着独特安全意识、安全范畴、安全原则与安全思维的理论典籍,因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深刻反映安全哲学理念的奇书。《周易》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为人的“生命、生存困境”提供了两套解释系统,一套是占筮(预测)系统,体现在经文卦爻象辞中;另一套是哲学义理系统,体现在传文的解释中。客观来

说，这两个系统都能给人的生命、生存困境提供一些合理的解释。《周易》关注人的生存发展的安危吉凶，文辞多有警戒危惧之意，弥漫着浓浓的忧患意识和居安思危、险中求胜的安危转换思维，易之道在于通过始终不懈地警戒惕惧，努力求得平安无险，没有灾咎。

此外，儒家礼法秩序的建构、管仲的国家安全思想、墨家的劳工保护理论、老庄的别样思维方式、《孙子兵法》中的军事安全思想以及后世的安全理论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